

曾巩研究论文集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曾巩研究论文集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8.7万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80

统一书号: 10110·414 定价: 1.40元

序 言

王水照

江西省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江西南丰隆重举行。本书就是在大会收到的论文基础上编选而成的。

初冬的曾巩故乡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驰名遐迩的南丰蜜桔获得了极好的收成。我们眺望盱江两岸翠绿茂密的桔林，也为解放后曾巩研究的第一批成果的取得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双重的丰收。

中国文学史上有些古代作家的遭际，他们在生前和死后的隆替毁誉，实在也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陶渊明这位六朝最大的诗人在钟嵘《诗品》中仅列“中品”，对李白发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深沉感叹的杜甫，自己不也是生前得不到应有评价，谢世许多年后才被人们认识到他是中国的“诗圣”？曾巩却与他们相反。他曾得到他的老师、同辈、门生的交口称誉，其文学和学术地位在当时实与王安石、苏轼等相埒，历元明清而盛名不衰。但从“五四”以来，特别是开国以来，他的名字突然从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消失了，遭到了异乎寻常的冷落。除了几部文学史一笔带过外，竟没有一篇研究文章！作为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我们对这种历史的

不公平表示遗憾，是很自然的；因而，对这第一批研究成果感到格外的欣喜和快慰，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我在学习了这些论文以后，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示。

一是研究范围力求“全”。曾巩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他是传统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他的诗，“平实清健，自为一家”（方回语）。从李清照《词论》把他和王安石相提并论来看，他该是一位属于“豪放词派”的词人。他又是以“经术”著名于世的学者，其学术思想（包括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也自具特色。此外，作为一个长期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员，又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政绩。所有这些，在大会收到的论文中都有所论列。（只有词，因作品绝大多数散佚，今仅存一首，无法评论）这也说明曾巩所建立的多方面的业绩，直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它的价值，仍然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虽然论文的作者各自成文，事先对选题并没有统一计划，但现在汇成一集，却俨然是一部体系完整的曾巩研究著作，从中可以看到曾巩的“全人”。

二是评价力求“准”。这些论文虽为纪念曾巩而作，却力避有些纪念文字的溢美、夸饰之弊，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掌握有关曾巩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真正从曾巩的遗产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也是对这位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收在本集中的论文在对曾巩诗、文的总评价、特色的概括和阐发乃至曾巩思想和理学的关系等多列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学术研究工作中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分歧和矛盾，必将通过今后的互相切磋、争鸣，获得很好

的解决，从而使我们对曾巩的认识更深刻，评价更准确。

三是视野力求“广”。这些论文以曾巩为研究对象，但并不局限于曾巩一个作家，而是力求从时代社会的、文化思潮的以及整个宋代文学的背景上来展开对曾巩的研究，眼界比较开阔。比如，离于对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宋代诸多散文大家的各自特点，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传统等问题的探讨，就不可能对曾巩以说理为主的散文作出具有说服力的阐明，正如离开对宋诗的时代特点的研究，不能解决曾巩诗歌特点和评价问题一样。大会上还提出宋代文学中“江西作家群”的问题，就与扩大研究视野有关。宋代的江西是一个文人荟萃、群星灿烂的地区。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有六位，江西就占了三位，即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而欧阳修作为文坛的领袖，对宋代古文运动的成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无怪前人有江西为“古文家乡”之称了。宋诗以“苏黄”为代表，实际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更能代表宋诗的特点，直接影响了南宋诗的发展。南宋的大诗人杨万里也是江西人。与杨万里同乡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专列“江西诗文”一条，推崇欧文、黄诗，并非仅仅出于对乡贤的尊重。再从词的方面说，据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的统计，宋代的江西词人共一百二十名，占全国第二位（第一位是包括国都临安在内的浙江）。在宋词发展过程中，江西词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宋初词坛就为晏（殊、几道）、欧一派所占领。大会对“江西作家群”形成的原因，它是否具有统一的地方色彩，曾巩在其中的地位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因此，我衷心感谢江西省社联、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抚州地区社联、文联和南丰县纪念曾巩活动办公室，他们主办的这次讨论会，成为曾巩和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我们的研究工作仅仅是“开端”，而不是终点。在“全”、“准”、“广”等方面，并未达到精诣的境界。我们的路程还远。我以为，除了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资料建设以外，我们的研究方法也要来一个突破。那种以政治风向为依归，先定“调子”、再凑材料、推而论之的演绎法，固不足取；就是那种就事论事、拘于一隅的简单的归纳法，也有很大的局限。近年来已有同志提倡综合研究法，实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综合研究之所以必需，就在于作家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文学也不是在封闭自足的圈子里演化发展的，总要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民族心理、作家习俗等发生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因此，我们研究的眼光就应该更开阔一些，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我们的工作，有时甚至要打破学科的界限。我们的选题，似乎过分集中于单个作家的研究，或者论其某一文学样式，或者论其某一具体作品，这类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又有其不足之处。我们迫切需要选择一些便于展开综合研究的题目。例如，宋代作家间的师承交游关系，就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钱惟演、欧阳修、苏轼都曾作为文坛盟主或领袖，而且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是在西昆体代表人物钱惟演的热情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梅尧臣和苏舜钦又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启迪者。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才华，欣喜疾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苏轼又对门生们说过：“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研究这种主盟形式对文学发展的具体作用，比单纯就诗论诗、就文论文不是更有意义吗？我每读欧阳修“缅怀京师友，文酒邈高会”的诗句，欣赏传为李公麟所画的《西园雅集图》，总引起对当时作家间交

游情形的许多遐想。他们在文酒诗会上究竟怎样互相切磋琢磨？这种活动方式对他们的创作究竟发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各自的风格、特点有否相互吸取而又彼此有意标新之处？遐想不等于科学研究，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细致完整地描绘出当时作家活动的具体情况，对于理解宋代作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无疑将有很大的裨益。

从这部论文集，我看到了曾巩和宋代文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绩，冲破了沉寂，填补了空白；同时也觉得领域尚待开拓，认识还须深入，水平亟需提高；然而又充满信心，相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开创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言	王水照
宋代文学研究亟待加强	吴庚舜 (1)
——为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而作	
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	王水照 (8)
义理精深, 独标灵彩	万云骏 (29)
——试论曾巩散文的朴素美	
曾巩诗歌散议	邱俊鹏 (41)
关于曾巩诗歌的评价问题	刘扬忠 (55)
曾巩诗歌艺术性初探	曾子鲁 (71)
“明道”说的深化, “义法”论的先导	成复旺 (83)
——谈曾巩的古文理论	
试论曾巩的学术思想	傅 义 (100)
论曾巩的哲学思想	陈 圣 (119)
浅谈曾巩杂记文的议论特色	傅开沛 (138)
略论曾巩题记文的思想内容	袁瑾洋 (145)
试论曾巩的史学观	杨佐经 (161)
曾巩的文论思想	赖功欧 (170)
从曾巩诗文的借鉴意义谈起	陈仰民 (178)
论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	钱贵成 (185)
曾巩诗歌内容初探	夏汉宁 (198)

刚柔相济与中庸之道.....刘加加 (210)

——曾巩思想和文学风格的特色及其关系

曾巩与王安石、欧阳修.....王 河 (216)

曾巩知齐二题.....荣宪宾 (235)

曾巩在福州.....王铁藩 (253)

宋代文学研究亟待加强

——为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而作

吴庚舜

曾巩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位有多方面贡献和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一直被尊为古文大家，诗也足以名家。在金石学（我国考古学的前身）上，他“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五百卷，对于推动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泯。他还是唐诗研究专家，在宋次道整理《李白集》的基础上，他注意李白作品的系年，颇有眼光。至于他和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秦观、陈师道这些师友弟子的关系，更是我们研究北宋中叶文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很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大作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几乎没有对他作过认真细致地研究，有些早该澄清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澄清。象袁枚的论曾文，《后山诗话》转述“世人”的论曾诗，就是两个既涉及对曾巩个人的评价，又牵涉到分析整个宋代文学的问题。

袁枚在《书茅氏八家文选》一文中对茅坤标举八大家表示异议，他说：

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

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络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

——《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一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东坡一》说：

《后山诗话》云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

这两段话，如果单从继承唐宋文（包括骈文）传统取径宜宽和指出一些作家的创作各有擅长，各有特征来说，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以唐宋文而论，除“八大家”外，人们还可以从魏征、陈子昂、张说、李华、肖颖士、李白、王维、元结、独孤及、陆贽、梁肃、李观、李翱、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皇甫湜、沈亚之、欧阳詹、张商隐、杜牧、刘蕡、皮日休、陆龟蒙、孙樵、罗隐、柳开、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宋祁、尹洙、石介、苏舜卿、周敦颐、司马光、沈括、黄庭坚、宗泽、李清照、赵明诚、胡铨、岳飞、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陈亮、姜夔、周密、文天祥等等作家的文章中读到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作品，大中型选本不应漏掉它们。但是，若从两次古文运动和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唐宋八大家”确实有其代表性。象在《中国文学史》中讲到北宋中叶散文时曾说：“这次革新是在宋初‘复古’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规模和成就当然更大。欧阳修一方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方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由于他的影响，产生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等作家。他们便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宋代六个大家。尽管他们的散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不尽一致，但其中有不少优秀的文章却是事实，而且他们还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

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因此，从我国文学史上说，北宋中叶是唐代古文运动以后的又一个散文的繁荣时期，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袁枚只看到三苏艺术风格之同而不见其异，只看到曾文的弱点而不见其长，特别是未从大的方面考虑苏洵、苏辙、曾巩的历史地位，显然带有片面性。

曾巩为文坛大家是天下公论。苏轼《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诗说：“辞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王安石《赠曾子固》也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日后犹为班与扬”。李清照虽然不满于曾词，但对曾文却相当推崇，她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词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晦翁语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与眉山苏公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杰然自为一代之文。”曾巩的文在八大家中有自己的风格，也是大家公认的。《宋史》曾巩本传传说就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明人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的概括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它说：“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情，名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曾巩的文章，论、传、序、书、记、诏策、表、疏、碑、劄子、奏状、启状、祭文、志铭、跋尾，诸体具备，内容比较丰富，今后的文学史和新的选本应当多作介绍，不能总是讲《墨池记》、《战国策目录序》等少数几篇。

在研究曾文时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的范围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便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曾巩这位大作家作出科学的评价。什么是“文学”？今天的概念很明

确。但麻烦的是在文学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关于文学这个概念是有发展变化的。假如我们不作细致的区分，一些非文学的东西便会被纳入文学史，使文学史的科学性受到影响。相反，如果完全以今天的概念去套古代文学现象，也会使一些在古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文学作品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而影响其科学性。

二十多年前，我对这个问题就想得不透，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有时反映出矛盾的心情。如一方面称赞王安石在散文上的卓越成就，一方面又说他的“文章主要是一些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即使如《游褒禅山记》和《伤仲永》，由于作家的写作意图本在说理，文章的议论成分又重，所以严格地讲，它们都不是文学作品”。类似这样一种欲严文学与非文学之界的观点，当时某些古代散文研究者也有，所以一位关心我国文学史研究事业的前辈说区分范围要作历史的叙述。他举例说《文选》中有我们今天不认为是文学的作品，但过去的文人是承认它们的。他还举例说国外有些散文家的作品，或者纯粹是议论，或者虽有叙事和抒情，但也有议论，这些都没有影响他们进入自己本国的文学史。他指出划分散文与非散文的标准要研究，如何看待论说文也要研究，他还强调说古代散文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值得多予研究，这的确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把古代散文这一文学现象分析透了，我们才能从中找到它的发展规律，并得到借鉴。

曾巩的诗名为其文名所掩。在《元丰类稿》中，他的存诗多达八卷，它们或刺时，或咏史，或咏怀，或论诗论文，或写景、记游、咏物，颇有特色。钱钟书先生曾说：“就‘八家’而论，他的诗比苏洵、苏轼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宋诗选注》曾巩小传）在宋诗革新运动中，他配合

欧、苏、王安石，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前人笼统地说他“短于韵语”，实欠公允。

在宋代文学研究工作中，曾巩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因为类似他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诗人、词人、文章家中举出不少，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加强这些薄弱环节的研究，我们编写新的文学史就将大受限制。

加强曾巩等一大批宋代文学家的研究也关系到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譬如编纂《全宋诗》、《全宋文》，就必须涉及到所有宋代作家的生活年代、生平事迹、作品的辑佚辨伪等等问题。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离开了全国宋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搞不好的。举两个小例子来说吧：第一、曾巩的名诗《城南》又见金人《遗山诗集》，今后编《全宋诗》和整理《遗山诗集》，要作出决断，不能再分属两家；第二，朱熹的《朱文正公集》卷四第一篇诗是《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它说：“我从铜川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总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桐。柳行随堤势，茅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春荣。渠水经复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十，饷子东皋耕。”这首诗和王绩名诗《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对照来读，一问一答，别有味道。而《全唐诗》卷三十八正有这首诗。该书朱仲晦小传说：“朱仲晦，王绩乡人，诗一首。”新出《王绩诗注》也采用了此说。它们都说唐人朱仲晦写了《答王无功问故园》，两诗文字略有出入，如“我从铜川来”，《全唐诗》作“我从铜州来”等等。这诗究竟该属谁呢？它既关系到编纂《全宋诗》，也关系到重新整理《全唐诗》，不可不弄清。从前读《全唐诗》，我也相信编者的话，

但后来对照研究王绩和朱熹诗，就发现《全唐诗》错了。因为无论是“铜州”还是“铜川”，都不是王绩的故乡。而且唐无铜川县，“铜州”，唐属少数民族政权，其地在今东北镜泊湖附近。唐初王绩一家或者他的乡人不会跑到那里去的。其实，朱仲晦即朱熹，大家都知道他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系徽州婺源（在今江西省）人。他写《答王无功在京恩故园见乡人问》和柳宗元写《天对》一样，并非同时代人唱和。不知清代熟读“圣贤”书的编者何以会出这样的纰缪？大约也是不熟悉宋诗之故吧。《全唐诗》误收其他宋诗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本文不再赘言了。

宋代文学研究亟待加强，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我们唐宋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扩大研究领域，突破原有水平，这是近几年来唐宋文学讨论会上一直在议论的中心话题，也可以说是全国唐宋文学研究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前进，给自己出的难题。

唐宋文学是一个富矿，优秀的唐宋文学作品是我们祖国珍贵的文学遗产。千百年来，它不知吸引了多少读者，滋润了多少作家。而且，随着我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向前发展，人民对这类精神食粮的需求更大，要求也更高了。正象大家知道的那样，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唐宋文学出版物是极其可观的，除了许多新印的书，还有再版的，其中总集、别集、专著、选本等等，发行量都相当大，仅《唐诗选》和《唐诗选注》，它们的累计印数已近一百八十万部。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种唐诗、宋诗、宋词、唐宋小说、唐宋文的选本，其印数就更为惊人。这一现象很能说明唐宋文学在今天的影响面有多么大。但是我们回顾成绩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唐宋文学研究工作，客观

上存在着不平衡状态（唐强宋弱），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通过
共同努力，把宋代文学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吧！

一九八三年冬于北京

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

王水照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激赏，也以为是曾巩所作。（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两位门生王安石和苏轼对曾巩也推崇备至。王安石《答王景山书》说：“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与段逢书》说：“巩文学议论，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他的《赠曾子固》诗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并说即使曾巩贫贱早死，也已可与班固、扬雄并肩了。苏轼则在《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中说，“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还把他比作遨游“万顷池”